

序 言

我对东盟五国经济的兴趣是在研究该地区和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以后发生的。几年以前，当东盟这个名称在地区内外还不那么普遍使用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同事曾经为“新航”而合作进行一项有关东盟各国经济一般背景的研究工作。这一计划使我们有机会游历东盟各国首都，搜集了直至最近的经济资料，使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素负盛誉的资料收藏得到补充。其后，我担任了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发展规划方面的顾问，从此对东盟各国经济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具有联合国这一地区机构的顾问身份，使我有机会进一步从国际的和地区的机关、甚至各国政府获得更多的原始资料。这本书就是过去几年所有这些机会和努力成果。

确切地说，我不是一个“东盟专家”，大概也没有人能够自命可膺这一头衔。一个人仅作为一个国家的专家已经够难的了，更何况是作为一个地区的专家，以东盟的情况而言，就是指兼备五国结为一体的专门知识。

这本书试图将东盟各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为了让范围广阔的重要课题都能纳入本书有限篇幅之内，不可避免要牺牲某些严密性以求概括。然而，研究各个东盟国家经济方面问题的专著并不缺乏。因此，把东盟各国经济作为一体，向较广泛的读者提出批判性剖析，这种研究却是需要的。

本书的特点是广泛利用各种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大部份

是不易在本地区以外的地方获得的。我的许多有价值资料是居住在东南亚的同胞和本地区一流经济学者的著作，部分原因是这些著作在他们本国以外的传播范围有限，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在本项研究的讨论中还带入一些他们所归纳的地区性观点。现将许多统计表格编排为独立的篇幅，以作正文的补充。

(下略)

黄朝翰

新加坡大学与哈佛大学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第 一 章

绪 论

第一节 东盟走向地区主义之路

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是一个地区性组织。它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东南亚五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外交部长在曼谷签署联合宣言的时候正式建立起来的。东盟这一组织的主旨是推进本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领域的合作。东盟成立后最初几年,对实现地区性合作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只是设立了通过定期协商求得五个成员国意见一致的体制。然而近年来,尤其是一九七五年印度支那的政局转变以来,东盟这部机器的车轮才真正开始转动。各种有关合作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考虑后,便作出努力以求实现。东盟目前正日益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集团,也日益引起超级大国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注意。

在地理上,东盟系由历来广义的“东南亚”的半岛和群岛部份地区所构成,事实上它占有“东南亚”的绝大部分,正如随便向地图看上一眼就会得到证实的那样。按其位置而言,东盟地区处于人口稠密的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大陆之间,

也在欧洲、澳大利亚和北美之间各条渡洋航线的聚合地区。航空时代的到来，并没有降低反而在事实上增强了这种地理位置上的有利条件，因为世界上主要的洲际航空线仍以本地区作为各个重要中转站的终点。历史也曾在本地区发展中起过它本身的作用。远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航海者到来以前，本地区就已经吸引了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商人，后来是移民。在别的地方，对香料及其他热带商品有很大的需求。获利丰厚的香料贸易大大地激发欧洲人来到东南亚；其后，他们攫取贸易控制权的决心导致了他们对本地区的政治统治，只有泰国是侥幸的例外。在欧洲的殖民统治下，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结构成为对各个宗主国家经济的补充。因此，本地区的初级资源受到开发，种植业部门得到发展，以便为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经济提供原材料。

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给东盟各国经济遗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痕迹。尽管它们独立以后作过多年非殖民化的努力，但许多东盟国家今天仍然在经济上摆脱不了先进工业国家牢固的束缚。诚然，这些密切的经济联系已不再由政治和军事力量来维持，而是通过贸易以及包括由财政、金钱、工艺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所组成的整个网络加以维系。

按文化、语言、宗教、种族、历史和传统而言，东盟是一个包括有多种不同源流的地区。各个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自然区域、人口规模 and 经济发展阶段都各不相同。如表 1·1 所示，按印度尼西亚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而言，它是本地区其他国家望尘莫及首屈一指的大国，但它的经济发展上却瞠乎其它国家之后。新加坡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它是一个城市国家，自然区域规模小到极点，但所拥有

的经济力量却大到同其土地面积不成比例的地步，与本地区一般发展阶段的步调很不一致。一九七五年，新加坡人口为印度尼西亚的百分之二弱，但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竟达到印度尼西亚水平的百分之二十。

尽管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差别，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对地区化的障碍，但在本地区各个领域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仍然有足够的共同立场和理论基础。各种有利于地区化的内聚力之一就是，东盟各国都致力于迅速的经济增长，把它作为国家最高的优先选择。正如它们也认识到的，只有通过它们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这点，而不是倚靠先进工业国家的外来经济援助。如果一个国家单独采取“自力更生”政策对促使经济迅速增长太不现实，那么，以地区为基础的“自力更生”则是可以接受的一种抉择，这是一种在当前第三世界迅速取得阵地的思想。七十年代早期的能源危机和原材料繁荣，使生产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与消费原材料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平衡发生变化，进一步给东盟国家带来一种经验教训，通过作为一个集团的一致行动，它们就能够利用更大的势力，在国际经济增长当中获得更加公平合理的份额。

在主权领土问题上，所有东盟国家彼此均对外部的更为安全表示关注，这种安全需求内部稳定和新的地区性平衡。安全的动机对于东盟各国是一种足够有力的刺激因素，使它们抑制其形形色色大相径庭的国家利益，而服从于联合行动。事实上，越南战后的余殃直接引起这样一种关系的激增，提供了大量必需的动力，使东盟这一组织的合作逐步登到目前的较高水平。

东南亚的地区主义并不是一件全新的现象。五十年代，这一地区曾目睹由美国发起并由西方列强控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出现，其时只有两个东南亚国家是正式会员国。此外，“东南亚条约组织”原是一个政治—军事机构，组建于冷战的目的。其后六十年代的“东南亚联盟”和“马非印组织”仍然是为政治考虑所推动，但很快就遭到夭折。六十年代，在经济领域中作了好几种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的尝试，在东南亚经济发展部长会议的赞助下，施行了一系列地区性方案（例如，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然而，这类合作的努力仅限于技术研究、训练、情报交流等，而没有考虑如贸易合作等那样的实质性问题。所以名副其实的经济合作很少发展，有关方面已在继续探索设立一个更有生命力的体制，使更大的经济合作潜力有可能在这一体制内获得开发。

东盟这一组织从开始就似乎许愿要在导向地方主义的探索中取得更大的成效。它是一个真正的本地组织，其核心思想是要避开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最现实不过的是，它拥有本地区其他国家望尘莫及首屈一指的大国印度尼西亚为其创始成员国之一，这一点立即象征性地显示与印度尼西亚对抗的终结以及印度尼西亚同本地区恢复结合一体的开端。尽管如此，东盟最初几年依然一事无成，尤其是按较长远的地区性经济一体化而论更是如此。所以一九七二年在 新加坡 举行的第五届部长会议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特别指出贸易和工业合作进展缓慢，即使各个成员国对彼此之间的問題已有较深入的了解。

回顾起来，东盟的第一个五年是通过协商、规划和协调以形成舆论的时期。初期的缓慢进展反映了对地区主义的实

质性障碍，但这毕竟不可能是一种错误的途径，否则，轻率的行动必然会伤害东盟的虚弱组织体制。事实上，东盟之所以能够这样长期生存而且还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倚靠朝向地区性一体化逐步前进的低基调战术，避免采用蔑视一致意见的激烈行动。那或许就是“东南亚方式”，并且非常可能是在一个地区实现持久的地区主义的唯一方式，而这个地区又是以各个国家的利益和期望均有巨大差异为其特点的。

经过一九七二年实事求是的评价以后，东盟曾作出若干努力，紧抓诸如扩大其行政机器、提出有关经济合作的重要建议、发展对地区外事务的统一立场等实质性问题。一九七五年五月在吉隆坡召开的第八届东盟部长会议标志着强调象征性热情的意义多，强调具体要素少的一系列会议寿终正寝。一九七五年印度支那的陷落，对本地区突然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平衡，把东盟的真正生存问题带到突出的地位上来。同时，新的政治气候给东盟组织注进必需的紧迫感和推动力量，并为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巴厘召开的第一届最高级会议铺平道路，这个会议标志着东盟已进入一个新时代。许多部长不断地穿梭往返于各国首都之间以及繁多的工作委员会都证明这样的事实，东盟现在已显示出它是有它自己的生命形象的。然而，东盟能否终于履行它娓娓动听的言词、什么形式的具体合作条款、它的经济一体化被吸引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有待证实。不容置疑，目前机器已得到改进，体制已有所加强，并且对地区主义的认真探索提供了动量。

简言之，东盟这一组织由各种特设的和永久的委员会行使职权，最后对部长年会负责。为了应付迅速扩大的争端和

问题，这一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横向和垂直结构的综合性网络组织系统。一九七五年在雅加达建立了中央秘书处。东盟的组织结构列示于上页图表。

第二节 发展成就：问题与前景

近年来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国家已加强对于发展经济问题的关注。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过去发展经济的努力看来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发展突破。而最近同全球性通货膨胀和衰退连系在一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浪潮、石油涨价、粮食短缺和世界商品市场的不稳定，严重地打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亚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过去几年它们按人口平均生活水平下降。危机的不断发展，在某些地区产生了失望和消沉，引导出世界末日救世方舟的理论，意指把遭到苦难的地区和人民从目前的经济窘境解救出来是枉费心机的。

对于正统派经济学者而言，救世方舟的概念原来是一种失败主义哲学，来源于含糊其词的静态假说，诸如，人口过剩和资源不足的对比等等。无论如何，对东盟五国来说，方舟尚未满载。首先，从整体而言，东盟各国都被列入中等收入类别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虽然印度尼西亚是个别属于低收入的一类。这个地区的再生和非再生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或许除了爪哇以外，它尚未被人口过剩所伤害，也未承受赤贫的压力，而在天平盘另一端的其他国家正在经历这种状况。如表 1.2 所示，一九七五年本地区占世界天然橡胶出口额的百分之八十三，出口它所生产棕榈油的百分之八十四，锡的百分之七十三，椰子产品的百分之七十六，此外还出口占来

自它的矿业和农业较大比例的其他商品。单是源源出口这类地理上特产的商品，就能够保证大量资源的转移以供本地区的发展。

近年来，本地区实际增长的成就也支持了这种乐观看法。“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曾建议发展中国家，达到实际国民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六，或按人口平均增长百分之三点五的一种指标。如表 1.3 所示，东盟国家已经实现，并且确实在七十年代的前半期就已超过这种指标，那时，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登上世界商品繁荣的顶峰。

一九七五年，东盟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已达到八百四十二美元（按时价），其幅度从印度尼西亚二百六十美元的低水平，到新加坡二千五百美元的高水平。如果联系到下面情况看来，这些数字的重要意义立即就非常明显，一九七三年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依然靠低于二百美元的平均收入而生活，而全世界一半国家按人口平均的收入依然低于二百八十美元。实际上，东盟的平均收入水平由于把新加坡按人口平均收入的高额数字计算在内而被夸大，一九七五年，新加坡水平实际上为联合王国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二，又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十七个向别国提供援助的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七。然而，应该注意到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它只不过是一种便于工作的计算经济增长的概念，因此对于经济和社会结构不相同的国家有关这种概念的利用和解释必须持高度慎重态度。计算国民总产值在概念上和验证上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不只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而且甚至对于先进国家经济也是如此。新加坡的经济比其东盟邻邦先进得多是无可怀疑的，但按不完善的国民总产值统计的表面

价值来证实新加坡人“平均”十倍富于印度尼西亚人，则是无稽之谈。最近国民收入问题专家们对于按常规计算的国民总产值和根据“国际价格系统”调整过的国民总产值完成了广泛研究，揭露了二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举例言之，一九七一年印度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为九十八美元，如果按国际价格估值和改按不变的美元汇率计算，则为三百四十二美元。类似的估算偏低无疑已发生于诸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各国经济。但对于新加坡，其偏差程度就会低得多，正如所观察到的那样，因为差幅指数“随着实际国内总产值的上升而趋于下降”。相反，对于新加坡经济的估算则实际上偏高，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按货币为之计值的部分以外，有许多经济活动没有记录入印度尼西亚国民总产值，却计入新加坡的国民总产值内。其次，新加坡的许多生产和消费活动，如暗沟工程和垃圾收集，是使城市经济运转所必需做的，本来就是真正的“中间”产品，但按惯例却作为最终产品依时记录入新加坡国民总产值。而当一个泰国农民“安步当车”往返于他的稻田时，并不为他的国家创造国民总产值，可是当一个新加坡人驱车上班而为地区出入许可证和停车场支付高昂的费用时，一直在提高他的国家的国民总产值！只须留意一下新加坡政府房屋发展局的官建楼房中所消费的许多东西和服务，是如此的不同于比方印度尼西亚的茅屋所消费的那许多东西，则可知把新加坡的国民总产值来与其他具有巨大而落后的农村部分的东盟国家作直接的比较就是毫无意义的。有理由这样说，每当把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各国经济作比较剖析时，应牢记着新加坡经济的城市工业化特征。

按常规计算的国民总产值不仅对国家之间的比较成为问题，而且对于穷国的真正发展速度也是不适当的指示器。正如表 1.3 所明示的，采取简单总合统计的形式表示经济增长，目前已广泛地认为没有反映出社会内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战略的失败，目前已使正统的发展规划者，甚至使诸如世界银行那样的发展机构，完全醒悟过来。同分配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的概念已公认为全然不足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前后情况。过去的那种基础狭窄的增长计算法，单独用于反映诸如贫困、失业、社会公平等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无效的。因此，不仅是经济增长率，而且增长的性质也将作为首要的争论问题而出现。

同时，东盟地区对于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成就的需求日增，不只是为了满足居民的日益增进的物质热望，还要维持地区的政治与社会安定。经济增长将为当局创造更多的资源以改善贫困状况，也提供更宽广的可选择余地以消除这些国家所固有的社会和种族的紧张关系，而缓慢的增长率却会加重那些社会冲突。东盟各国政府日益倾向于采取更为严厉的中央控制的型式，它们需要使经济获得进一步成功，以提高现政权领导的合法性和可靠性，或者在没有革命动乱的情况下维持政治和社会现状。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东盟各国经济增长的能力对于外界经济因素特别敏感，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国民总产值为期短暂的高速增长可主要归因于外界的刺激。然而，由于世界贸易增长的持续呆滞以及发达国家资本和工艺技术流入量的减少，同时它们的保护主义倾向又与日俱增，因此在目前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本地区的发展已比过去两个十

年困难得多。这个十年的剩余时间，或许还有下一个十年，本地区会按某种比例降低以前那些高速增长的想法。一九七三年东盟国家全都经历了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这种空前的繁荣可能很难再次出现。与此相反，大部分东盟国家的经济也许将保持约百分之六的增长率，由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深赖于市场多变的矿产品，因而具有达到稍高水平的潜力。首先，发达国家什么时候或者甚至能否再次夺得六十年代晚期它们所经历过的高速增长是十分靠不住的。其次，即使工业国家恢复经济高速增长，也不会自动成为发展中国家能实现他们发展潜力的保证，这种寄望于工业国家的设想是不可靠的。外向的东盟国家经济最好能有一致的见解，即在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型式下，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繁荣只是一种前提条件，而不足以成为它们自身繁荣增长的决定因素。

简言之，在未来的岁月中，东盟面临的经济发展的新挑战是一件极其错综复杂的事和困难的工作。不只是要重新得到过去的增长动量，而且要把更多的努力和资源调整改向符合于社会和体制的新目标。因此，新的发展战略要有更广泛的根据并且使之适应较低收入阶层的基本需要。既然利用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来充分发挥它们的发展潜力日益不易，东盟国家也许有必要以东盟体制为基础，谋求为更加面向本地区的自力更生的发展而作出共同努力。

第二章

贸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依赖性

大家知道，东盟所有五个国家的经济本来就是非常面向贸易的，各自拥有相当大的对外经济成分和较高的贸易—产量比率。除开某些规制性的诸如政治稳定等有利的前提条件之外，近年来东盟经济之所以高度增长，可追溯到两个相互联系着的重要因素：内部出现高度的资本形成，而外部则为出口繁荣。所有东盟国家一意把占它们国民总产值很大比例的资金用作固定资本形成，而且这个比例与年俱增。如表2.1所示，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期间，本地区的年平均资本形成率成倍增加，由百分之十点八增至百分之二十点九，并在一九七五年继续增高到百分之二十七点四。这种速率与同一时期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所实现高速度发展的经济相比较，南朝鲜为百分之二十五至二十六，台湾为百分之二十九至三十，但较之南亚诸国则高得多，印度大致为百分之十八，巴基斯坦为百分之十二，斯里兰卡为百分之十四。从总的看来，通过首先扩大本地区的增长潜力，然后予以保持，自当引发资本形成获得累进的高速率。

东盟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每当兴举投资时，往往进口大批机器设备和大量建筑材料。因此，投资的上升与进口的增加具有密切联系着的相互关系。但是，进口的增加最终还是要靠出口的增加。因此，东盟经济增长的真正机制

实质上依存于出口的扩大，以增加它们获得满足进口要求的能力。表 2.1 也反映，在出口繁荣达到顶峰的年代，本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有三分之一是出口部门所创造的（马来西亚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九七一年至七五年期间，东盟出口值对总产值的比率为百分之二十七，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率（一九七三年为百分之二十四），差不多是发达国家的二倍，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倍。随之而来的是，当前东盟的生产对于受外部变化的影响也相应地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敏感，而较其他国家集团则更甚。表 2.2 所示的出口与国民总产值增长之间的准确关系，更清楚地证实所有东盟国家的经济一般都有很大的出口弹性，充分说明其高度依赖于贸易。

在市场经济的增长机制中，出口经常被视为自发的和外在的因素。因为本地区的出口主要由其他国家、尤其是工业国家的需求状况所决定，这点就特别适合于东盟各国经济的情况。因此，这种出口推动型的经济增长便把本地区束缚于由西方和日本等工业国控制的从属性的国际体制。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同时是推向依赖的机器。根据衡量比较，我们将了解到，增长的发动机对本地区的好处倾向于超过贸易依赖性的反逆作用。

在经济学家当中，“依赖性”的意义往往由于他们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引起争论。这一概念是来自不发达国家殖民地时期的历史经验。这些国家的经济被认为是从属性质的，因为它们须严重依赖于对外贸易、付款、资本、工艺技术，甚至依赖于外部决策来推动国内的经济的发展过程。因此造成这样一种格局，一类国家的经济必须以另一类国家的增长和扩

大为条件。绝大多数这些国家的经济，除少数例外，都倾向属于是小规模，为了利用它们的比较利益，必然会引起外贸上对生产专业化的需要，这一事实就成为这种全面从属性质的经济结构的基础。这类经济在它们的出口中一般必然有一个国际贸易对本国产品的高比率，一个出口商品产地高度集中和一个出口地的高度集中。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认为，这种“依赖性”是国际资本主义历史过程所固有的贫国与富国之间不平等经济关系体系中的典型产物。然而，很多有关“依赖性”的假说，仅以六十年代的验证分析为根据，却是过于简单化或者缺乏验证价值；例如，规模不是一个不变因素，从作为一种原动力的观点上来看，它与集中的贸易结构的关系在统计学上远比教条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复杂得多。

有理由这样说，“依赖性”的概念应慎重对待，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相对性的见解，适合于两分法的思想，即适合于诸如一个国家或者是“依赖的”或者是“独立的”等这样的见解，而事实上现代世界却以“相互依赖”为主——至少是正在出现的全球性经济秩序所明显遵循的方向。因此，人们会很容易地观察到，东南亚地区对日本的过度依赖，而日本接着又为本身对外部原料供应和市场的依赖性深切担心。

从本项研究的前后关系来看，“依赖性的命题”，无论如何可以说是分析东盟经济对外经济成分的方便起点。确实人们可以从“依赖性”体制内观察到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对外活动，从而获得不少的见识。

第一节 有形贸易的型式

东盟的经济依赖性的结构，可从它的特殊的贸易结构和它的贸易关系型式充分地显示出来。一九七五年东盟总贸易额为四百四十二亿美元，占世界贸易额的百分之二点八，稍低于达到高峰的一九七四年，该年为百分之二点九，但高于十年前的百分之二点一。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四年期间，本地区经历了一个出口繁荣时期，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达百分之三十二点二，高于世界平均数字，而且高于除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集团（见表2.3）。即使不问七十年代早期“不正常”的向上摆动，东盟国家的长期出口活动也给人以深刻印象（见表2.4）。然而，本地区对于国际贸易舞台的真正影响，不在于其较高的世界份额，也不在于它的增长动量，而是它对世界商品市场的优势地位（见表1.2）。

从不同角度观察，至少从其政策制订者的理解发出，东盟生产了世界初级商品和矿石的很有分量的比例，可以被认为是东盟各国经济唯一的致命弱点。公平地说，东盟的经济依赖结构并未导致如同非主流派经济学者往往所认为的经济榨取（汲取资本或经济剩余）。从其过去经验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足以证实依赖性就是经济相对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然而，依赖性产生了过度专业化的生产结构，以致本地区在对付外力时缺少变换资源的灵活性。自五十年代以来，本地区发展经济学者和规划者已经看到初级出口产品的专业化使东盟国家的经济易因国外政策的突然变化而呈不稳和使出口收益长期呈